

· 石刻与墓志 ·

读唐人碑志札记

黄 清 发

笔者近因涉猎唐人碑志，发现唐人碑志中存有一些前人较少留意的现象，特将之拾掇成篇，以就正于世之博雅君子。

—

唐人碑志中存在着称呼上的性别异位现象，最明显者莫过于称女尼为和尚，前人已有注意于此者，如《八琼室金石补正》卷 32《大唐都景福寺□□和上像龕铭》：“和上讳灵觉，俗姓武氏，赠□（泐约八字）□□之次女也。”文后陆增祥按语云：“尼称和上，与惠源志同。”又如同书卷 69 载《唐故龙花寺内外临坛大德韦和尚墓志》，后引《古泉山馆金石文编》云：“明是女尼，而亦称僧与和尚也，与孟法师碑称女道士为法师同意。”可见陆氏已注意唐人碑志中的这一现象。除此之外，女尼称法师、禅师亦可看作是一种称呼上的性别异位现象，因此清梁玉绳《志铭广例》卷 1《尼称法师禅师和上》即将此视为唐志体例的一种而揭出之。著名史学家岑仲勉先生亦曾专门谈及此问题，他在《金石证史》中即列“韦和尚墓志”条，并云“尼称和尚，碑志中除《比丘尼惠源志铭》题称惠源和上外，此复见之”（《金石论丛》页 69），后又于《贞石证史》中列“韦和上志”条，岑氏见于石刻者，共计三通，

故云“墓志尼称和上或和尚者，合此凡三”，并再举见于文集者二，即《全唐文》卷 501 权德舆《唐故东京安国寺契微和尚塔铭》与卷 948 辛溥《故真空寺尼韦提墓志》。据上述五志，岑先生认为，在墓志中称尼为和上或和尚的现象，“在唐代固常有之。”（参《金石论丛》页 151）其实，除上述所云外，在唐人碑志中尚存有称男性为氏及称女性为君或府君两种称谓上的性别异位现象。在唐人碑志中，男性墓主一般冠以府君、君、公、先生等称呼，而以府君称者似最为常见，但翻阅唐人碑志，其中尚有男性称氏者。有些从碑志标题即可看出，如《八琼室金石补正》卷 56《有唐薛氏故夫人实信优婆夷未曾有功德塔铭》，同书卷 68《刘氏张夫人墓志》，后有陆氏按语，云“张夫人之夫为刘通”。又，《古刻丛钞》也载有三例，即贞元廿一年《唐故许氏夫人祈氏墓志》、大中九年《唐故陆氏刘夫人墓志铭》及会昌五年《唐故陆氏庐江郡何夫人墓志铭》。新近出土的墓志中也存在这种情况，如《唐代墓志汇编》（周绍良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所载贞观 129《维大唐骑都尉王氏故妻墓》及龙朔 063《唐故荀氏杨夫人墓志铭并序》。有些仅志文中可见，如《千唐志斋藏志》所载《大唐故田夫人墓志》，志曰：“爰自待年，言归柳氏。”（页 18）《全唐文》卷 526 柳岷撰《李丕墓志》：“长女适河东柳氏名岷，试太常寺奉礼郎。”（页 5349）有些在志题及志文均见，如《唐代墓志汇编》显庆 115《大唐故徐氏路夫人墓志铭并序》：“夫人路氏，洛州河南人也。代袭簪纓，家传冠冕，年甫十八，出适于同县徐氏。”（页 303）与唐碑志中存在的称男性为氏现象的同时，唐志中亦存有称女性为君的例子，如《全唐文》卷 344 颜真卿撰《夫人颜君（真定）神道碣铭》即是一例，因此梁玉绳亦将它列为唐人志墓体例的一种，在《志铭广例》卷 1 列有《妇人称君》条。在近年来出土的墓志中，我们又发现有一通称女性为府君的墓志，即《唐代墓志汇编》所载贞观 099《唐故朝散大夫王伏兴妻吕府君之铭》，但在唐人碑志

中，称女性为君或府君的现象与称男性为氏者相比要少许多。从上述两种现象我们可以看出，唐人志墓时对墓主的称呼，在性别方面似乎并没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二

有关唐人碑志的各种异称，前人早有归纳，如清梁玉绳《志铭广例》卷1《题无定称》：“凡题曰元堂志、曰窆域志、曰葬志、曰墓识、曰厝志、曰祔志、曰殡志、曰葬记、曰墓记、曰茔兆记、曰圻记、曰坟记、曰石记、曰砖记、曰塔记、曰圻铭、曰埋铭、曰瘞铭、曰墓砖铭、曰墓版文、曰石椁铭，名虽不全，俱志铭之类耳。”对唐人墓志的各种名称概括得极为详尽，但对于唐代为数众多的僧人碑志，却语焉未详。叶奕苞《金石录补·自序》云：“唐碑佛家最多而杂，且非正史所载，考订殊难。”叶奕苞是从考订史实之角度而言的，但若从文体而言，佛家碑多而杂却正可看出僧人碑志名称的多样性。

僧人死后，一般于火化后再起塔安葬，与这种墓葬方式相适应，僧人碑志名称也就多与塔有关。有云塔碑者，如《宝刻丛编》卷8《唐一行禅师塔碑》及《唐龙首寺会觉法师塔碑》；有云功德塔碑铭者，《金薤琳琅》卷12载有《唐少林寺灵运禅师功德塔碑铭》；有云玄秘塔碑者，如《金薤琳琅》卷14《唐大达法师元秘塔碑铭》，《金石萃编》卷113亦收此碑，题为《唐故左街僧录内供奉一教谈论引驾大德安国寺上座赐紫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但以此为称者，唐碑志中似仅见此；有称灰身塔铭文者，如《八琼室金石补正》卷29所载《慈润寺故大灵琛禅师灰身塔铭文》，以灰身塔（铭文）为题者，其志文一般较简略，有时仅一行。且以此为名者，一般多出现于唐初贞观、显庆年间，从《唐代墓志汇编》中所载的僧人墓志中可看出这一点。可归入此类者尚有石塔碑、灵塔碑、灵塔铭、灵塔颂、灵塔记、塔颂、塔碣、身塔铭、身

塔石记、寿塔铭、塔记等。另外，僧人碑中常刻有佛像，故有以像塔铭称者，如《安阳县金石录》卷3《大周相州安阳灵泉寺故寺主大德智□师像塔之铭》及《唐故方律师像塔之铭》。僧人于火化后所得曰舍利，僧人碑志中即有以此称者，如舍利塔碑，《宝刻丛编》卷8《唐广济大师含真和尚舍利塔碑》及同书卷15《唐佛驮禅师舍利塔碑》，即为此类。亦有称舍利塔记者，如《宝刻丛编》卷15所载《南唐东林寺上方禅师舍利塔记》。

僧人死后除塔葬外，尚有造龕志铭的现象，如《八琼室金石补正》卷32《大唐都景福寺□□和上像龕铭》，文云“遂于龙门西岩造龕……遂为铭曰”，故僧人碑志名有与龕有关者，如本志即称像龕铭。另尚有龕茔记，如《芒洛冢墓遗文补遗》收有《□□□京大奉国寺故上座龕茔记》；石洞志，《宝刻丛编》卷19所载《唐大云寺岑公石洞志》。除此之外，还有以影堂而名者，如影堂碑，《宝刻丛编》卷8《唐东林寺慧远法师影堂碑》及《宝刻类编》卷8《杯渡禅师影堂碑》；影堂记，《宝刻类编》卷4《径山大觉禅师国一影堂记》、《嘉祥寺大觉禅师影堂记》；真堂记，《宝刻丛编》卷15《唐东林大师真堂记》；影塔之铭，《安阳县金石录》卷3《大唐相州安阳县大云寺故大德灵慧法师影塔之铭》，均为僧人碑志异称。

同时，僧人碑志中亦有径以碑、墓志称者，前者如《宝刻丛编》卷8所载《归义寺大智禅师碑》，后者如《陕西金石志》卷12《大唐广福寺静业和尚墓志》、《金石萃编》卷91《思道禅师墓志》及同书卷95《唐故张禅师墓志铭并序》，据《唐故张禅师墓志铭并序》所载“依择吉辰□月十九日荼毗入塔”一句，可见墓主卒后已立塔，但未曰塔铭，而名之曰墓志铭。亦有以神空志铭称者，如《金石萃编》卷82《大唐济度寺故大德比丘尼惠源和上神空志铭并序》，《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对该志名曰神空作有考释：“浮屠之法，焚骨而瘞之于塔。此独云神空者，盖墓不塔也。”我们似乎可以认

为，碑志未以塔名者，似与墓主采取俗世入葬方式有关，若从这一点来推测，尚可归入者有方坟记，如《平津读碑记》卷4载《化度寺海禅师方坟记》；石坟哀志铭，如《宝刻丛编》卷15《唐东林寺律大德熙怡石坟哀志铭》。可见僧人碑志的名称，很大程度上跟墓主所葬的方式有关。

僧人碑志的命名除与入葬方式有关外，与碑志中所载志文内容也有关。在唐僧人碑志中即有主要根据碑志内容来命名者，这一类型的碑志有称刻石记德文者，如《八琼室金石补正续编》卷19《慈润寺故大论师慧休法师刻石记德文》；有曰神道影堂纪德碑者，如同书卷34《唐北岳慧炬寺建寺故禅师神道影堂纪德碑并叙》；有云传法碑者，如《金石萃编》卷114《唐故圭峰定慧禅师传法碑》；有称心印记者，如《宝刻丛编》卷7《唐普觉寺持律比丘心印记》，均属此类。

除上述所列，僧人碑志还因其数量多而且种类杂，常存有石刻中“不经见之体”（叶昌炽《语石》卷6语），如《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卷10所载《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志云：“诸受业沙门，北就高顶起塔，置石优填王释迦像，并累师之行状，勒在佛碑。”此志《八琼室金石补正续编》卷22、陆耀遹《金石续编》卷6均收，即是以行状刻石者。可归入此一类者，尚有行业碑、道迹碑、道行记等。另外，尚存有以行记、记称者，前者如《八琼室金石补正续编》卷16《灵裕大法师行记》、《金石萃编》卷114《大唐花岩寺杜顺和尚行记》（《八琼室金石补正》卷75载为《花严寺杜顺和尚行记》），后者如《宝刻丛编》卷8所载之《唐泗州和尚记》，似都应视为行状之变体。

从以上对僧人碑志名称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发现，僧人碑志的命名极其多样性，这或许正可看出它当时在社会上应用之广泛。